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先后三次到过原解放军第八医院。那时,我们口头上都称它为八医院。如果说日喀则是海拔最高的边防军分区,那么八医院就是当时全军海拔最高的医院了。当年部队进驻日喀则,医院就是几顶帐篷,后来修了土坯房。门诊部、住院部、办公区以及医护人员的宿舍,全是土坯房。黄黄的一片,与四周光秃秃的山浑然一体。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医院才搬进水泥楼房。

我曾有幸两次去八医院采访,两次都住在土坯房里。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土坯房是里外两间,外面那间堆满了汽油桶。我整夜在汽油的熏陶下入睡,梦境因此而气味浓郁。土坯房很矮,关窗时我发现窗户坏了,关不上,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发怵。在那个房子里,我住了5天,采访了十几个女军人。

十多年后,我认识了一个在日喀则长大的孩子。她3岁进藏,随父亲辗转数地,少女时代就在八医院度过,如今是个女少校了。我问女少校:“记忆里的八医院什么样?”她说:“一排排的土坯房和高大的杨树林。”我说:“我也是这样的,对这两点记忆尤甚。一想到八医院,就是三个色调:天湛蓝,树碧绿,房子焦黄。”

我们说的那些树,是杨树。就在八医院住院部的旁边。我对树总是敏感,在采访中特意询问它们的来历,于是得知,这些树就是最早建设八医院的军人们种下的。几十年的岁月,已让它们成长为高大笔直的树汉子,粗壮、健美。虽然是冬季,也并没有呈现出被寒风肃杀的凄凉景象。白亮的树干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依旧朝气蓬勃。我非常喜欢它们,采访的空隙,总是在里面徜徉,呼吸着它们的清香。

在西藏,树林被称之为林卡。这片林卡,是四十多年前第18军的战士们栽下的。如今树已成林,栽树人却没有享受到它们的阴凉。一位老18军女战士,如今已退休的女军医对我讲述了这片林卡的来历。“医院刚搬来时,这里蒿草遍地,乱石成堆,野狗 roaming。我们顾不上这些,搭上帐篷就开始接收病号工作了。我记得有一次上夜班,我刚走出帐篷,一只野狐狸从我脚下窜过,吓得我把马灯都扔了。后来工作走上正轨,我们年轻人就开始憧憬未来。那时我们也谈恋爱,但连个说悄悄话的地方都找不到,每个帐篷住七八个人,外面又是一片荒凉。我们就开始栽树了。刨开乱石,填进泥土,小心地种下树苗。在西藏栽树是很不容易的,没有自来水,浇树的水全靠我们到雅鲁藏布江去挑。可浇下一桶水,琢磨一声就让干涸的乱石滩吸干了。我们的肩膀磨出了老茧,腰也挑弯了。第一年栽下的树苗只有三分之一。但我们没有气馁,第二年又栽。我们想,要让这树林和我们的青春同步。一年又一年,这些树终于活下来了。西藏的树一旦成活,生命力是很强的,它们迅速地成长为一棵树

我在202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跋山涉水去探访一条红军走过的道。

道在巴山北坡的陕西省岚皋县堰门镇堰门村,村前为汉江支流洞河,河对岸为同省的紫阳县。进了紫阳县,翻过巴山,便到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核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当年,走在这条道上的是一支由69人组成的红军队伍。他们是中共安康军特支组织发动的国民党部队起义人员,从安康城出发奔赴四川巴中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起义部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红军道上的岚皋人心里记着红军,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县志里记载了这一壮举。

村庄坐山临河。山梁连着一座山梁,逶迤直抵巴山,河水潺潺倔强地从汉江直路上巴山。巴山另一侧红旗招展,刻满了红军标语的革命根据地,便是进驻堰门村的红军想要去的地方。向往“红军的老家”的起义部队,举起镰刀斧头的红旗,连夜急行军,溯汉江南岸而上,在第二天傍晚时分分入堰门村,进驻堰门村的时间为1934年正月初十。

93岁的陈启桂老人,发白如雪,却耳聪目明,住在堰门二组卢家院子,已五代同堂。我见到她时,她正坐在桌前帮儿媳剥蒜瓣。说起当年的事,老人说:“红军来的那年我七岁多了,已记得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没见过的人,还是个背着枪,八十多年了,到现在都忘不了。我记得,队伍来时,天麻麻黑了,村里人见来了队伍都躲到山上花栎庵树林里。来的队伍有几十号人,都穿着灰军衣,住在卢家四房院子,祠堂院子和马家院子里。战士们见屋里没人便到树林边喊,说老乡莫怕,我们是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请老乡们回家吧。胆子大的男人们回家了,一直没啥事便喊叫树林里的人,树林里的人也都回家了。有三个人住在我家,我在门外不敢进屋,有个人对我说,小娃娃,你莫

林。不过,等这片树成为林卡时,我的青春也早已过去。但每当我看到年轻人在里面开心地唱歌跳舞时,我心里就感到极大的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林卡伴随了我的青春,还将伴随许许多多军人的青春。后来,领导宣布我离休时,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想了半天,说:“欢送会能不能在林卡里开?”领导同意了。散会后,我一个人穿着大衣走进了林卡。我忽然觉得天地间一下安静了,只留下我和那些美丽的白杨树。我想,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忘掉它们了。”

这位女军医不愿让我写出她的名字,我只能尊重她的意愿。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她已回到了成都。很可能她每天就走在那些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中间,买菜、做饭。但她的内心,将永远想着西藏,想着那片静谧的林卡。

也是在那次采访中,有一位叫陶秀英的女医生,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半个多世纪前就有女兵走进西藏的史事。陶医生不是第一批女兵,但却是一批进藏的医护人员。她在日喀则度过了她的大半生,并且,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在日喀则工作,一个在拉萨工作。她的孙子则在日喀则上学。她说,我们真的是采访了青春献子孙。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是从她那里。

写到这里,我忽然很惦记这位老军医,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她是否回到成都?是否健在?她的孩子们,还在高原吗?都好吗?

那次对女军人的采访,让我深受教育:即对自己的生活知足。能够住在氧气充足的地方,能够每天看到儿女,是那些女人们最渴望的事情。对于这种幸福,我却浑然不觉。所以无论条件怎样艰苦,我都没停止采访。在最最难熬的日子里,我总是对自己说,别忘了你也是军人……

1997年,我再到八医院时,是五月,景色与冬天有着很大的差别。阳光澄澈,连土坯房都色彩鲜艳。杨树林更是生机勃勃,在风中舒展着它们的美丽,树冠绿油油的,树干是灰白色的,漂亮极了。你走近看,会发现树干上还有很多“大眼睛”。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树结疤吗?不好听。但它们真的像眼睛一样。

那次去八医院,是原西藏军区创作室的冉启培陪我去的。我自己住在医院里,他去了日喀则军分区,他在那边也有采访任务。小冉走时,给我介绍了一个护士,叫高静。我提出当晚跟高静一

春访堰门红军道

■杜文涛

怕,你们是好‘粮子’,不欺负人。三个人说着外地口音,抱着枪围着柴火,坐在木凳上靠着墙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妈给那三个人煮了一顿红苕苞谷粥吃,他们便到下面院子里集合到一起走了。”

坐在陈启桂老人身旁,我打开了手机地图,此屋距安康城105公里。一夜一昼,穿林翻山,那是多么风疾的速度,又是多么艰难的行程。

卢在宝家在卢家四房院子天井屋的一侧,石基、木柱、木板窗、木格窗、泥瓦屋顶,一派清末气象。旧屋里的他,说起院里的旧事,回想着去世多年的父亲曾说过的话。他的父亲叫卢本群,红军来时二十多岁。那天天冷,他父亲给红军抱来两个花栎树挖磨根煨火,院子里住着二十多个红军。天井正屋里三个领头模样的人在屋里开会,像是商量啥事,有个高个子背上背个长把子,手上还捏个短壳子,门口有三个人在放哨。

说着话,卢在宝领我们来到他家左侧,指着一处空屋地基说,这是那正屋的地方,老房是卢哲学家的。老人已经去世,儿孙们都进了城,房子没人住,前两年下大雨漏水便垮了。屋基水泥铺面,硬化过的地面平整光滑,泛着溜溜的白光,隐藏着屋主人对旧屋有过的珍视。身仁平展的地基上,我的脚步有些沉重,眼光有些凝固,脚下的一步也许都是红军先辈们踩路过的地方。身

起值夜班,院里同意了。老实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想好写什么,只是有个大概的想法,想写西藏军人,男女都写,所以想体验一下女军人的生活。

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事。由于我经常进藏,并且经常在西藏部队采访,我的一位女战友就委托了我一件事,她托我到西藏后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她少女时代暗恋过的男同学,后来他大学毕业后参军到了部队,然后到了西藏。这些年他们失去了联系。她很希望我能帮她打听听到他的下落。可是除了他的名字、职业(军医),她再没提供别的信息了。

我当时想,怎么可能找到呢?西藏那么大,军人那么多,军医也那么多,我跑的地方却是有限的。所以答应归答应,我并没采取什么行动。这回从拉萨到山南,从山南到米林,又从米林返拉萨,再从拉萨到日喀则,一路走来,一点儿与之相关的信息我也没碰到。

那天晚上9点,我跟着外科护士高静去上夜班。高静是河北人,个子高高的,脸庞红扑扑的,健康开朗。她忙碌,我跟着看,抽空和她聊天。毕竟在西藏当护士,还是有很多常人没有的见识和经历。我挺有收获。

到了夜里,她刚闲下来,走廊上忽然传来一阵嘈杂。高静职业性地跳起来冲出门外,很快就没人影。我也跟了出去,看见医护人员簇拥着一副担架进了急救室。过了一会儿高静跑回来对我说:“重伤员,要输血,我得去叫护士长。”我说:“我和你一起去。”我们俩拿手电筒就往外跑。

天很黑。西藏的夜晚通常都有大月亮的,偏偏这天晚上没有。我和高静互相拉扯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医院。路上高静告诉我,送来的是个小战士,施工时开挖土机,挖土机翻了。小战士想保机器没有跳下来,结果被压在了机器下面。晚上6点受伤后,一直昏迷到现在。我问:“为什么现在才送来?”高静说:“部队离这儿太远了,一百多公里的路,路况差,天黑还不能开车。”

护士是个藏族女人,家就在医院外面的一所藏民院子里。高静冲着院子叫护士长,最先回应她的是狗吠,接着灯亮了。高静说:“走吧,我们回去吧。”我说:“你不是护士长出来?”她说:“不用等,她会马上来的。她已经习惯了,经常被我们半夜叫醒。”果然,我们刚回到科里,护士长卓玛就来了。卓玛一来就上了等在那里的救护车,到附近的采血点

旁每一处立着的墙基、屋面临着我的眼光,也许也落过红军先辈们的眼光。这是一支刚刚起义组建成的红军队伍经历的寒冷而漆黑的一晚;这是一夜一昼急行军后红军战士首次歇脚的地方;这是红军纵队指挥员曾经聚首商谈过事的地方。

村里第一书记唐晓娟是县上派驻村上的扶贫干部,她给我们带着路,也给我们讲解着红军道上的事。她说,根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在屋里临时开会的应该是纵队三位首长。他们是纵队长袁作舟、纵队政委王辛德、纵队游击指挥王泰诚。袁作舟为中共安康军特支军事委员,原任安康城国民党绥军特支书记,原公开身份为安康绥军司令部《民知时报》记者;王泰诚为中共安康军特支宣传委员,原任安康城国民党绥军特支书记,原公开身份为安康绥军司令部《民知时报》记者;王泰诚为中共安康军特支宣传委员,原任安康城国民党绥军特支书记,原公开身份为安康绥军司令部《民知时报》记者。

三位共产党员,三位腥风险境里的红军指挥员。在这空屋基上,我不禁想象着,那晚,他们都说过怎样的话,他们是怎样说的,谁北谁南,谁西谁东?

卢氏祠堂收藏着卢氏先民的过去,也记忆着红军的往事。卢氏祠堂当晚也住着十多位红军,这是卢家四房院子到河边的捷径处。天亮时分,三位红军指挥员也许从这石狮对望、壁画高堂的清式老屋前走过的。流年湮蚀里,屋子已显破旧,屋檐一角坍塌,椽子露出陈年的质感,漫着深幽幽

采血去了。高静告诉我,他们医院每次输血时都是现去采集,因为没有好的贮存设备。医院为此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献血人群,以备急用。

回到病房,高静开始填写那个战士的住院资料。小战士才19岁。我问她:“谁送伤员来的?”高静说:“肯定是军医。”军医这个词触动了我,我说:“这军医叫什么名字啊?”高静说:“不知道。他们吃饭去了。”我暗想,不会那么巧吧?但既然遇见一个军医,总得问问,也许同一个行当的,容易了解情况。

过了很长时间,也没见人上护士办公室来。我惦记着那个受伤的小战士。高静说:“你可以上手术室去看看他。”手术室黑着灯,显然手术已经完成了。可伤员送到哪儿去了呢?我想找个人问一下,却四下无人。我一间一间病房找,终于在走廊尽头,发现一个亮着灯的房间。我走过去,一个护士正好出来,我问:“今晚送来的那个受伤的小战士呢?”护士说:“就在这儿。”我进去,见小战士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输血的、输氧的、导尿的。让人看着心悸,心痛。床边还趴着一个人,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

我问护士:“脱离危险了吗?”护士说:“眼下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了,但很惨。”我说:“怎么,残疾了吗?”她说:“是的。”他才19岁啊,就在突然之间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他还能遭遇爱情吗?他的父母还有别的孩子吗?他醒来之后,发现这一切时,会是怎样的心境呢?我非常难过,心里堵得慌,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一个老兵走进来。我问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老兵回答了我。我随口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某某的军医?”老兵朝着床边那个人努努嘴说:“他就是啊。”

“他就是?”我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瞪目结舌,吃惊地张大了嘴。老兵说:“对呀,他去年调到我们卫生队的。”我真是万分惊讶,惊讶得有些心跳加速。这样巧合的事,是需要天意的。我毫不掩饰我的惊喜,我说:“太巧了,我就是想找他呢!”

老兵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我连忙主动介绍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和你们军医是同学,很多年没联系了,托我打听他,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老兵释然了,但并不和我一起惊喜,也许他觉得这很平常。他说:“那好吧,等会儿他醒了我就告诉他。”

“等他醒了?”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能

灰蒙蒙的色。窗棂雕着花卉,时光已蹭去了确切的线条,让人猜度着木刻人最初的匠心。

从这里再出发,前方,有着一条约一条沟壑,有着一座又一座山坡,有着一个又一个未知,有着一场又一场血雨。唐晓娟说,党史资料上记载,起义的红军队伍顺洞河而下,为了避开洞河街上的民团,队伍从堰门村下游的青春村曹家老院子门前涉水渡过洞河,沿红岩口沟而上进入紫阳。正月十五清晨过营盘大梁时,遭到李靖山民团等重兵包围。经过一整天激战,纵队游击指挥王泰诚等人当场壮烈牺牲,纵队政委王辛德等部分官兵被俘,纵队长袁作舟带领十多人成功突围,最终经紫阳黄草梁到达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卢氏祠堂外侧生着棵一人怀抱不住的板栗树,树皮皱褶,柯节凌厉,树龄也许百年抑或两百年了。那年正月间的板栗树,是什么模样呢?正月时节的板栗树,树叶应是褪落的。板栗树的枝杈间,也许洒落着银白的残雪。

春阳下,洞河潺潺,明澈剔透。地畴里油菜花淌金鏊彩,泛着莹莹的亮光。坡上山桃花、樱花开着,灿然着一丛丛的绢白。地垄上成群的村民在栽种黄桃和柿子树苗,唐晓娟隔空和他们打着招呼。

身旁有三三两两的游客漫步。路边有着游人指示牌,有着一方又一方的木牌式解说词。唐晓娟说,脚下的路便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也是游人来到村上后,要身临其境,来行走体味味的路。

行走,能找到历史纵深的入口。我在粉白如锦,红花映衬的道上走着,盘桓于青山绿水之间。前方,似乎有一支扁扁钢枪,快步匆遽的队伍。他们衣袂飘逸,襟衫带风,脚下有着脚掌摩擦地面的簌簌声响。

我顿了顿足底,铆了铆劲,加快了前行的脚步。

叫醒他?我不解。老兵说:“他太累了,刚才吃面的时候吃着吃着就睡着了,面都没吃完。让他再睡会儿吧。”这我相信,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军医始终没动一下,睡得很沉很沉。可是,我真是想马上叫醒他,告诉我我所受之托,看看他惊喜的样子。

但我终于没叫醒他。我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大概事由,还有那位女友现在的单位和电话,就离开了。我一再嘱咐老兵,他一醒来就告诉我,我要和他说不重要的事情。

回到病房已经是凌晨2点了,我困得不行,连打两个哈欠,眼泪也出来了。高静在看书,好像很习惯夜班了。她说:“你去睡会儿吧。”我说:“好,我去睡会儿。如果军医来了你就叫我。”高静说:“好的。”我去了值班室的小屋,脚上暖着高静给我灌的热水输液瓶,很快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时,走廊一阵嘈杂。我拉开灯看表,7点了,不明白高静何以没有叫我。我连忙爬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去,高静还坐在那里看书,好像我的离开只是一瞬间。她抬起头看见我说:“怎么起来了?我还想让你多睡会儿呢。”我说:“那个军医呢?他还睡?”高静说:“不知道,一直没来过。”我觉得不对劲儿,咚咚咚地跑上楼去。

跑到那间特护室,看见受伤的小战士仍插着各种管子躺在那儿。但在他身边的已不是军医了,而是那个老兵。我连忙问:“军医呢?”老兵说:“走了,4点走的。”我大吃一惊:“怎么走了呢?他不知道我要找他吗?”老兵说:“知道,我告诉他了。我把你的纸条给他了。”我很失望,怎么会这样?早知如此我就不睡觉了。

老兵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喏,这是他留给你的。”

我连忙接过,打开看,上面是龙飞凤舞的一行字:“对不起作家,来不及和你见面了,我必须8点以前赶回部队,家里没其他医生了。谢谢你,我会和她联系的,也请你把我的电话和地址转给她。”后面就是他的电话和地址。我就这样错过了一次精彩的邂逅。我放好纸条,走过去看小战士,看这个19岁就遭遇了重大挫折的孩子,眼泪又忍不住掉下来。不知是不是麻药的作用,此刻他的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安详,平和,充满稚气。我心里默默为他祈祷着,好半天才难过地离开了病房。

太阳升起来了,天地通明。我走出医院,到街上的邮局给远在北京的女友发了一张明信片。简单地告诉我我昨夜的遭遇,最后我说:“我是因为你才遭遇这个夜晚的,但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你了。”

我想她不会明白的。就像没来过西藏的人,总也无法想象风雪高原有怎样的风雪。我把一张小小的明信片写满了,然后意犹未尽地丢进了邮箱。丢进去后我才想起,我忘了写上那位军医的地址和电话。

很久之后,我的女友告诉我,军医给她打了电话。其实我已经不关心后面的事情了。我对他们的关注,到那天晚上为止。

在西藏,总有奇迹发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会唱歌的机票

■张子影

起飞了 机票在指尖唱歌
歌声如清风拂吹
你床前的玫瑰 眨眼开了
军用运输机
带来的春天如此多情
那群穿迷彩的军人
是春天派来的第一批
光明使者

阳光从天际降临
玫瑰的歌唱回响在每一个角落
什么也无法阻挡
这穿越季节的歌声
穿过悲伤 流年
以及失散的红颜
聚拢起全部的隐忍
还有力量 直通岁月
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不是死亡
而是渺茫
而机票的歌声如黎明前的光照
照耀光明之旅
希望降临 黑暗颤抖着躲避
无数窒息的花朵 重新开放
无数晦暗的门窗 重新敞亮
这从未企及的飞翔啊
连天堂鸟也含泪梦想
这是至爱的宣告
这是至纯的深情 久远绵长
歌声的光芒
把忧伤和恐惧消亡
把黑暗和混沌照亮

歌声里的春意一如既往
歌声里的春天情意深长
歌声之下
这个春天 将光芒万丈

中国的春天

■包立群

待一只看不见的手
与另一只手
与另很多只手 握在一起
一个笑脸探出头来
许多脸也便次第笑出弯弯的弧度

那些抱有敌意的风
那些抱憾而去的花儿
拂走了很多日子
魔鬼与天使 冬与春天
一念之间 垒起一道墙
隔开欢笑与眼泪
一场疫情 牵累万物 十指连心
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目送它渐行渐远
然后抚摸伤痛
在风中 放一缕坚强
历经考验的国度
很多人点亮微光 照亮自己
然后再照亮别人
照亮那些再也无法回家的人

善良是打开光亮的钥匙
光亮会安慰每个生命
道一声平安
从春天次生的丛林
绿意蔓延的草原
从高岗到每个荒芜的角落
无一遗漏

任何心机和技巧以及谎言
都会败给春天
只有真诚不再拥挤
林林总总 密密匝匝
绿色会带来多彩天空
同样也会带来生机勃勃的大地
我们不会说出很多道理
我们会用生命的坚守
一起向世界 传递中国的春天

